

以西方之学术 灌输于中国

——容闳及其《西学东渐记》

容宏是近代中国办理出洋留学事务的先驱，他的特殊经历和一生的事业，反映出中国当时认识西方、引进西学过程中的蹒跚步履。

1828年冬，容闳出生于广东南屏镇一个贫困的家庭内，生计艰难，不能专力读书治学。但南屏镇是一个距澳门仅六公里多的地方，而澳门是最早被西方占据的中国领土，西方人士在中国办学，以也澳门为最早。1834年，英国伦敦妇女会议提倡在远东开办女学，教士古特拉富（也译作郭士立）夫人便到澳门试办女学堂。次年，马礼逊教育会也准备在澳门开办学校，招收男生，先委托古特拉富夫人女学暂为寄读，容闳的父母便设法托人把容闳送来就学。后女学堂停办，容闳还家，1840年其父逝世，于是与兄、姐共同支撑家计，早晚劳

作,十分艰苦。1839年马礼逊学校开课,校长为美国人勃朗。但容闳当时并未得知,至1841年才入学,次年即随校迁至香港。1846年,勃朗回国,行前表示愿携几名学生到美国留学,于是容闳、黄胜、黄宽等三人自愿随往,这成为决定容闳一生事业的最大转机。

美国在容闳的眼中,无疑是一个崭新的世界,这位不满二十岁的青年,渡过印度洋、大西洋,也就跨越了从封建制的旧国度到近代资本主义西方的一整个时代。进入中学以后,除了学好英文之外,还有算术、文法、生理、心理等等课程。求学期间除得到一部分资助外,常要打些零工补贴生活,而很幸运地遇到的学校校长和教师均不歧视中国人,却给予较多的照顾。中学毕业之际,容宏选择了继续在美国求学,并考入了著名的耶鲁大学。当时,有美国好心的师长和友人,劝其接受教会界的资助,只消签定一纸大学毕业从事传教工作即可。而这位艰苦环境长大、极有独立自主精神的中国青年,虽早已信奉天主教,却认为自己虽然贫穷,但却应当拥有最为宝贵的自由,将来应当择最有益于中国的事业而为之,决不因贫穷而改变宗旨,从而拒绝了这一丰厚的奖学资助。

在耶鲁大学读书时,他争取到了某妇女团体一点慈善性资助,兼做为同学预备饭菜、管理图书等工作维持生活。读书极为刻苦,常至半夜,并无游戏运动闲暇,其英文论说连续获奖,因而受到教师器重。至耶鲁大学不久,他改换了洋服,剪去了发辫,但激荡在心灵中的为中华民族奋发图强的精神却一点儿没有稍减,修业期间,就非常关注中国的发展状况,而常为中国的腐败风气而忧心忡忡,而暗暗立下了改变中国落后状态的志愿。对此,容闳自述称:

予既远涉重洋,身受文明之教育,且以辛勤刻苦,幸遂于

求学之志，虽未能事事如愿以偿，然律以普通教育之资格，予固大可以自命为已受教育之人矣。既以自命为已受教育之人，则当日夕图维，以冀生平所学，得以见诸实用。此种观念，予无时不耿耿于心。盖当第四学年中尚未毕业时，已预计将来应行之事，规画大略于胸中矣。

容闳对自己一生事业的规划是什么呢？那就是他所自述的“以西方之学术，灌输于中国，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。”

1854年，容闳从耶鲁大学毕业，此时，他在思想和学识上都具备了与美国知识分子相同的基本素质。他作为第一名毕业于美国第一流大学的中国留学生，引起了美国各界的注意，毕业留在美国是不难谋求较好职业的。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环境，对于他已经很不适应，而且他连汉语汉文也几乎忘光了，因此有的美国人认为：在中国没有什么需要他去做的事，那里除了卑微的亲属外，他没有朋友，不会给他任何地位和照顾，而且他不可能不被猜疑、歧视和敌对，摆在他前面的是一派阴郁险恶的前景。但凭着一颗报效祖国的火热的心，容闳毅然登上轮船，返回了家乡。

容闳回到广东，加紧补习汉语汉文，而映入他眼帘的第一个大的场景，乃是1855年清廷和两广总督叶名琛指挥的血腥屠杀农民。当时太平天国运动兴起，各地农民零星暴动也时有爆发，清军以极残酷的手段予以镇压，此年一个夏天即在广东屠杀了七万五千人，其中多为既非太平军，也未参加暴动的无辜百姓。容闳曾亲到刑场观看，只见累累陈尸，流血成池，不由得愤懑之极，而心怀同情太平军之意。此后，他曾试图向太平天国献计以行其志愿，未被采纳回辞归；曾在香港谋职、在上海海关任职、在英商公司任职等等，或被排斥、或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，或公司歇业，均为时未久又

复失业,而这些职业对实现他心中的抱负也并无裨益,所以并不感到可惜。在这一阶段的经历中,他从现实生活中隐约感觉到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欺凌和经济侵略,一次,一个英国人寻衅殴打他,他立刻回击,事后感慨地说:“他日中国教育普及,人人咸解公权、私权之意义,尔时无论何人,有敢侵害其权力者,必有胆力起而自卫矣。……即外人之以强权蚕食我边疆,扩充其势力,我国人亦岂能常听其自由行动乎?”经商时乘船于长江,感到“设中国无欧西各国之干涉,得完全行使其主权,则扬子江开浚后,其利益实未可限量……彼西人者何不与中国以时机,俾得自行解决其国内问题耶?”由于容闳对西方,尤其是对美国怀有太多的好感,这些话语算是他对列强侵略中国的最深的认识极限。

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,给容闳施行其“魂梦不忘之教育计划”提供了一定的机遇。1863年,太平天国政权已处于难以挽回的败势,镇压太平军有功、而颇有权势的曾国藩已经考虑建设新式兵工厂的问题。这一年,曾国藩在安庆招见了容闳,询问“今日欲为中国谋最有益最重要之事业,当从何处着手?”容闳因已知曾氏本意,便暂按下他的教育计划,对以建设机器厂,并要有“制造机器之机器”。后上海江南机器厂设立,容闳被委派到美国购办机器,完成任务后,被授以“候补同知”的官衔,在江苏衙门为译员,并结识了丁日昌。容闳将自己的教育规划讲与丁日昌,丁氏甚表赞同,愿为之辗转上达。于是,容闳写成四项建议,一是建成合资轮船公司搞民用运输,二是派遣留学生出洋,三是开采矿物,四是限制外国教会干涉人民词讼。除第四条外,前三条皆属洋务运动的范围,是学习西方以图富强之举,但当时全国办洋务者,尚只在兴建军事工业阶段,所以容闳的建议实为洋务思想的前列。丁日昌本拟请洋务派军机大臣文祥代为上奏,但文祥逝世,容闳的希望

再次落空。

1870年,发生了天津教案,曾国藩、丁日昌等人奉命充任调停大臣,容闳为译员。趁此机会,他重又提起办留学教育计划,得到几位大臣支持,拟定计划,代为上奏,得到清廷旨准,这使容闳喜出望外,将之看成“将于中国二千年历史中,特开新纪元”的大事。继而组织人力,订立章程,决定分四批派遣,每期三十人,共一百二十人,每人学习十五年。学员为十二岁至十五岁之间,考试及格后先入预备学校学习英文,一年后再赴美国留学。

1872年夏,第一批留学生三十人渡太平洋至美国,容闳先期到美国联络,在美国建立了留学事务所,管理中国官派留学生事宜。1875年,第三批留学生抵达美国,已满初步计划的一百二十人之数,容闳任留学生监督,另外,还有旧派官僚陈兰彬也在留学事务所任监督。

陈兰彬为出身于科举进士的翰林官,当初筹划派遣留学生之事时,丁日昌考虑到为减少守旧派的阻力,故意荐请陈兰彬参预其事。容、陈二人同为学生监督,而思想意识完全不同,凡学生服装、游戏、运动及寄居美国人家而同为祈祷等杂事,陈兰彬皆视为非同小可,常与学生冲突,因而对留学生事务极为厌恶,将美国的教育看成一种污染。后清政府任命陈兰彬与容闳为驻美国正副公使,容闳表示不能舍留学生事务于不顾,愿辞去公使职任,专任留学生监督。结果,容闳仍被任为副公使,兼留学生监督之任,而陈兰彬则举吴子登为留学生监督,与容闳共事。吴子登是一个极顽固的守旧官僚,早将向外国派遣留学生视为离经叛道行为,至美国后,对留学生行动百般挑剔,并向清政府报告留学生们如何放荡、如何不务学习正业、如何渐入耶稣教会,认为这些留学生将失去爱国心,纵能学成回国,也有害于社会。随后,美国国会和政界也掀起

排斥华人情绪,美国政府拒绝了容闳欲送部分留学生入军校学习的请求,美国国会还通过禁止华工议案,于是吴子登借机兴风作浪,向清廷提出撤回所有留学生,归国后交地方官严加管束。1881年,留学事务所解散,一百多名留学生全然撤回,容闳的教育计划归于失败。

容闳以多年美国留学的经历,深切体会到西方资本主义优于中国的封建社会,十分向往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文明输入于中国。他以自身经历为蓝本,设计了派遣少年留学生出国留学十五年,育成具有新思想、新技能的人才,藉以改变中国的落后状态。“藉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,必可使此老大帝国,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”,这是容闳终生的理想和信念。但他却万没想到封建中国的守旧势力对留学事务如此深恶,必欲毁之而后快。本来,中国的守旧官僚对洋务运动的一切举措均持反对和抵制,中国留学生少年出国,多经年所而蜕化为具有自由民主思想的“洋鬼”,这比兴办工矿、铁路等实业更为顽固派所不能容忍。容闳认为:青年留学生在美国“终日饱吸自由之空气”,一切言行举止渐改其故态,受美国所同化,“固有不期然而然者,此不足为学生责也。”而清朝设留学生监督一职,实际上是希望中国留学生保持其封建性的旧态,只学些新技艺而已。既资本主义的西方文明对青少年有莫大感染力,容闳对此又理解纵容,便只有召回留学生而不顾其学业半途而废了。这次经办留学事务的失败,使容闳认识到,一个封建专制、政治腐败的政府,是不能真正对外开放,学习和引进先进文化的,“而于中国根本上之改革,认为不能稍缓之事。”后来,容闳投身于康有为发动的维新运动,戊戌政变后,受到清廷的通缉追捕,只好逃亡到美国,从此未能返回中国。他在美国避难期间,用英文写成自身经历的回忆录,记述了他的理想、志愿和为之奋斗的过程。容

闳创办中国少年出国留学的事务虽然失败,但开辟了中国先进人士认识世界、学习西方的一条新的思路、新的途径,向国外派遣留学生,后来毕竟不可阻挡地发展起来,在中国青年出国留学的历史中,不能隐没容闳的首创示范之功,当清朝灭亡之后,有人将容闳的回忆录译成中文,广泛流传,书名没有采用原英文书名“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”,而改以《西学东渐记》。所谓“西学东渐”,意即为西方的学术文化流传入东方的中国,这个书名虽未忠于原文,但却为学术界和广大读者所乐于接受,一则说明人们对容闳的贡献予以承认,二则说明西学东渐已成为不可阻厄的时代潮流,这也是容闳一生理想和精神的寄托所在。